

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 ——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分析

唐雪琼¹, 钱俊希², 陈岚雪¹

(1.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 昆明 650224; 2. 英国爱丁堡大学地学学院, 爱丁堡 EH8 9XP)

摘要: 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 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 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元阳哈播、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 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 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 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 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传承的来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 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 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 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 从地方认同走向世界文化。

关键词: 文化适应; 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节日文化; 长街宴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1)05-0835-10

1 引言

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 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的现象^[1]。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研究文化适应问题, 形成了多种文化适应的理论和模式。典型的如 Adler 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 认为文化适应过程经历接触阶段、崩溃阶段、重新整合阶段、自治阶段和独立阶段^[2]; Berry 的“跨文化适应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广泛、得到多次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模型^[3], 认为文化适应者有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四种适应策略^[4]; 基于 Berry 没有重视主流文化群体对移民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的缺陷, Bourhis 等学者提出“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 认为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都具有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个人主义五种文化适应取向^[5]。这些文化适应的理论多是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 在对移民群体和留学人员群体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化提升而形成的。国内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起步晚, 成果不多, 主要集中于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6,7]和西方文化适应理论的介绍与总结^[3,8,9]。

在全球旅游蓬勃发展的时代, 游客与目的地居民频繁接触交流带来众多的文化适应现象, 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域封闭的少数民族社区, 受到游客带来的主流文化影响后的文化适应问题更为突出。而这一文化适应过程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还较少。

文化重构是指“文化体系的再造, 特别是价值系统的重新建构, 以及文化模式的铸造、文化类型的规整”^[10]。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做出的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合是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已经成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的理论依据, 受到学

收稿日期: 2010-12-21; 修订日期: 2011-03-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61005, 40961006)

作者简介: 唐雪琼(1969-), 女,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社区、旅游影响。

E-mail: tangxueqiong@163.com

者们的重视。Cohen 认为文化是有活力的和灵活多变的,当地人为了吸引游客而在传统文化中加入新的元素,被新元素修饰的文化旅游产品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一种演示^[11]; Cano 等实例研究了墨西哥 Huaquechula 小镇为了极力促进当地的黑色旅游 (thanatourism) 而挖掘整合传统“亡灵祭日”(Day of Dead) 中的文化因素^[12]; Cahir 等追溯了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一种夜间祭祀狂欢会 (corroboree) 发展成为旅游产品的历史过程^[13]。这些研究认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不一定会导致传统意义的消失,反而会在另一个角度上使其绽放光彩。国内学者的研究强调了文化重构原则及其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14~16]。学者们对于文化重构过程、机制等缺少具体深入的研究。

少数民族节日是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是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展演的重要载体。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调适和重构节日文化推动旅游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得到地方民众和政府的重视,很多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如泼水节、昂玛突节、火把节等都经历了由最初的一个小小的民族民间节日转变为新型的、场面恢宏的节日活动的成长过程。成长过程中节日文化的形态变迁、动力机制等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均较少涉及。本文以哈尼族长街宴为例,研究旅游发展中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变迁,对于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亦提出文化重构与文化适应与特定的地方性的再生产是密切相关的。民族节庆活动进入旅游市场,本身即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经济关系的实现过程。任何社会关系的实现都必须以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媒介^[17]。旅游行为本身,亦是基于不同的旅游社区与游客对于地方性不断的想象与再想象。本地的旅游社区为了实现旅游发展的目的,必须营造出新的地方的形象,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以实现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两类行为之间的互补与结合。因此,正如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地理学对于地方意义新的解读所揭示的,地方性与地方文化身份可以通过一种表演 (performance) 的形式呈现出来^[18,19],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对自身意义进行重构^[20,21]。

2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哈尼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世居民族之一,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哈尼族人口数 144 万人,主要分布云南省南部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哀牢山的元江、墨江、红河、元阳、绿春、金平、江城等县是哈尼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占本族总人口的 76%,占这些地区总人口的 50% 以上。同时也是哈尼族民族风情最浓郁的区域。

哈尼族节日中的长街宴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影响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节日活动之一。节日那天,村民们沿村里的街道从街头到街尾摆出一桌接一桌的酒宴,也称为“长龙宴”或“街心宴”。传统的长街宴是哈尼男人交流感情、切磋生产技艺,共同祈祷或祝福梯田粮食丰收、家庭安康、村寨平安的重要节日,也是其乡土文化的重要元素。

长街宴作为农耕祭祀文化的产物,起源于哈尼先民从“嘎鲁嘎则”迁徙到“诺罗普楚”时期(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哈尼族祖先的起源史和迁徙史而不断得到发展^[22],成为哈尼族三大节日昂玛突节、苦扎扎节、“十月年”的重要活动。元阳的哈播、箐口、全福庄、红河甲寅等地的哈尼老人都有对 1949 年前村寨摆长街宴的清晰记忆^①。

^①资料来源:笔者 2007 年 1 月 13 日、2007 年 11 月 24 日、2009 年 12 月 23 日分别在元阳箐口村和全福庄村、红河甲寅、元阳哈播村与哈尼老人的深度访谈。

1950~1970 年代末,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长街宴活动被迫停止。1980 年代以后, 文化选择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向文化主体回归, 哈播及周边的哈尼族村寨于 1980 年最先恢复了昂玛突节长街宴。红河甲寅、浪提等地在 1993 年由于阿卡文化研讨会的召开, 推动和促进了“十月年”长街宴的恢复与发展。长街宴作为地方独特性的一部分, 对于构建外界对于哈尼族文化空间的想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形势, 绿春县城哈尼族长街宴、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民族特色长街宴等则更以恢宏的场面、独特的创意延续和展示了长街宴文化。

本文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绿春、元阳、红河、金平为案例地。本文在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间共 7 次 52 天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 参加了绿春十月年长街宴、元阳哈播、箐口昂玛突节长街宴、元阳箐口苦扎扎节长街宴、红河甲寅十月年长街宴、昆明国际旅游节小吃长街宴等活动, 与哈尼研究学者、村民、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等 26 人进行深度访谈, 获得了大量关于长街宴节日文化变迁的资料。

元阳哈播的昂玛突节长街宴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大、仪式传统而被哈尼村民和学者认为是所有长街宴活动中最地道和典型的。

而绿春长街宴则是旅游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规模大、游客多。研究主要通过上述两个案例, 探讨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

3 旅游影响下元阳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的文化适应

3.1 元阳哈播村的旅游发展

哈播村位于元阳县城南部 115km, 隶属元阳县俄扎乡哈播村委会。2009 年 12 月有 418 户人家, 1864 人, 全部村民都是哈尼族, 他们以梯田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哈播梯田是元阳梯田中坡度最陡、立体感最强、观赏梯田日出最好的地方。哈播村以歌舞之乡享誉云南省, 红河州舞台的哈尼族木鼓舞、棕扇舞、碗舞, 木雀舞等均源于此村, 是哈尼族民俗、音乐、舞蹈与稻作文化全面融合的地方。

1994 年后, 政府介入哈播村昂玛突节长街宴活动, 哈播长街宴为愈来愈多的游客所认知, 参加长街宴的游客不断增多, 很多年份游客超过千人。游客多为长街宴一日游客, 也有少数参加昂玛突节第一天祭寨神活动的二日游游客, 其他的日子少有游客的到来。

3.2 文化适应过程中节日传统习俗和规范的地方认同

旅游活动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空间行为, 特定的文化元素必须与特定的空间结合, 才能形成独特的地方意义。昂玛突节长街宴是哈尼族古老而大型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时间、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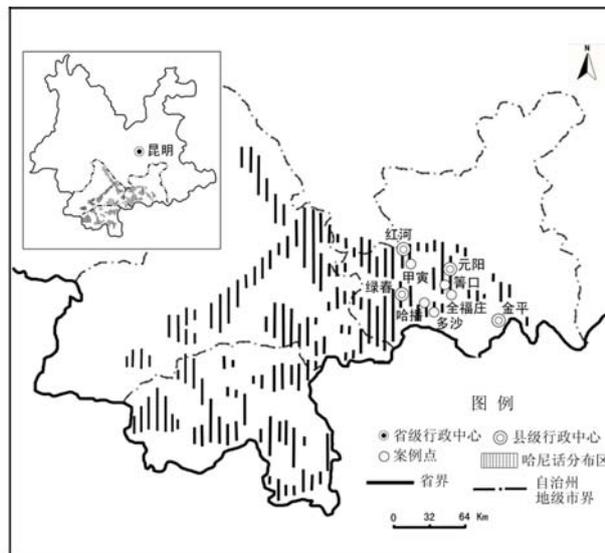


图 1 云南省哈尼族分布和案例地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Hani Group
and case areas of the study

所、形式、祭祀过程、祭品、品饮礼仪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和禁忌，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是哈尼族地区地方性的标志性符号。为了更好地实现长街宴的旅游与经济效益，当地政府曾考虑在时间、规模、形式等方面对长街宴进行调适。然而这种调适与传统的文化认同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昂玛突节的日子是咪谷^①算出来的，是有规矩^②的。2003年政府要求提前办，所以那一年（2004年）寨子里死人特别多，连续死了8、9个年轻人，不出3天就死一个人，田里谷子收成不好，寨子里猪鸡也不顺利”。（哈播村民石××，2007.1.31）

“政府给不给补助无所谓，这个节日要按传统来办，给多少钱，我们也不愿意选日子办长街宴。”（哈播村民卢××，2007.2.1）

“祭寨神的地方，女人一个也不准进去。以前有个女记者进了寨神林，破坏了原来的规矩，使村里发生了一些不吉利的事情。现在不管什么领导、特殊人物、女人都不得进去。但是到现在村子都没有恢复到以前平静和睦的日子。打个比方：就好象撕破了一张纸又把它粘起来，怎么都恢复不到以前的样子了。”（哈播村摩批^③，2007.1.31）

“2006年的时候，乡上为了增强与红河甲寅长街宴的旅游竞争（力），要求村民把原来摆两天的长街宴合在一天摆，摆了480桌，扩大了哈播长街宴的规模。后来由于村民的强烈反对又恢复摆两天的传统习俗。”（俄扎乡人大李主席，2009.12.24）

哈尼族身处高山的自然环境阻碍了村寨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村民们按照经年累月形成的传统习俗和规范日复一日地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进行着固定的仪式。旅游发展带来的长街宴时间和形式等的调整也由于村民们的文化抵制回归于传统规范。强烈的地方认同促使当地村民在旅游影响面前自觉产生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然而，随着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不断深入，文化适应的功能日益增强，哈尼村民们在努力维护固有文化的同时，亦有意无意地成为地方特性的媒介。地方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做出的有选择性的创新与发展是文化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也是必然的结果。

3.3 文化适应过程中长街宴文化的变迁

3.3.1 传统长街宴对现代旅游的回应 为了加快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旅游的发展，村民们每年都要发出几百份请柬，邀请远方的客人参加长街宴。邀请的宾客包括：哈播村外出工作取得成就的荣誉村民、曾经给予哈播村支持的单位和个人、关心哈播村发展的领导和朋友。同时，在县广播站进行多次长街宴的宣传，在国道214公路旁立“哈播长街宴”的大型广告牌，在穿过哈播村的公路段拉“哈播长街宴欢迎您”的条幅。

长街宴当天上午安排富有民族特色的热闹欢快的迎宾活动，哈播村委会的村干部，身着节日盛装、拎着竹筒酒壶、捧着放满烟酒的盘子、挂着写有“长龙宴欢迎您”绶带的哈尼姑娘，在寨门处向不断到来的客人们敬上自酿的美酒。身穿深蓝色服装的老年妇女吹着哔噜（哈尼族民间乐器）、敲着怀鲁格（哈尼族民间乐器）、跳着乐作舞（哈尼族传统舞蹈），身着黑色衣服的老年男人手拿一米多长的烟头、迈着舞步、弹响喇喝（哈尼族民间乐器），还有手持鲜艳纸花、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口号的纯朴哈尼少年，共同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

村民们为游客准备了嘉宾证和礼品，游客在来宾接待处交纳礼金后领取礼品和长街宴

①哈尼语的汉字音译，是村寨祭祀活动的祭司，主持昂玛突节祭寨神、长街宴等活动。

②哈播村昂玛突节是农历十二月属龙日中的一天祭寨神，第二天在寨子中的街道上摆长街宴。

③摩批是哈尼语的汉字音译，俗称“贝玛”，是哈尼社会中知识广博的智者，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主持宗教礼仪活动。

坐席的嘉宾证。村寨中还设置了“接待处”、“午餐就餐处”、“WC”等标识牌，以及便于游客购买民族工艺品的工艺品销售摊位。

前几年（1994~2001年），哈播长街宴还借鉴现代许多大型活动的形式，在长街宴活动的当天上午11点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州县领导致词祝贺，村干部代表全体村民向游客们表达热烈的欢迎。后来觉得不合适，就取消了。（俄扎乡人大李主席，2009.12.24）

“长街宴哈尼族跳舞是与宴会同时进行的，男人在桌子上喝酒吃肉，女人们就在街心宽一点的地方跳罗作舞助兴，周边的几个村子到现在还保留这种习俗^①。现在哈播长街宴的歌舞活动集中到长街宴的前一天晚上，村委会组织哈播村和周边三台坡村、多沙村的村民文艺队经过认真的排练，将哈尼族和彝族民间歌舞以一台晚会的形式献给游客和村民们。”（俄扎乡人大李主席，2009.12.24）

“以前敬酒就在桌子上碰个杯，不像现在这样子^②，一桌一桌去敬，这是跟你们汉人学的。”（哈播村民李××，2009.12.23）

游客群体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以其权威话语的价值导向不断影响着地方传统，长街宴的“地方性”不断与“现代性”产生关联，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长街宴在旅游发展中由地方自在文化的状态，变为一种明显的自觉行为。

3.3.2 长街宴传统禁忌和规矩的淡化 地方性可以看做是一系列社会规范与文化传统在某个地理空间集中表现的结果。随着相应的社会文化规则的改变，地方意义亦在不断重构之中。按照古训，年轻的哈尼妇女不能在长街宴入座。但女游客却可以在长街宴上除咪谷坐的那桌外的任意一桌入座，且都能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2009年哈播长街宴上甚至有4名本村的哈尼姑娘坐在自家的桌子上招呼客人，而同一天在相邻的多沙村长街宴，女游客只能在长街宴尾部为老年妇女摆的三桌入座，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

“吃一点阿玛萨尼^③，来年（明年）就能得到寨神的保佑，我们的习俗是要先吃阿玛萨尼，再吃其他的菜。很多客人不懂这个（习俗），有些客人没吃阿玛萨尼就走了。”

（哈播村民李××，2009.12.23）

用手抓菜吃、弄掉筷子、打翻饭碗和酒杯等行为，是餐桌上很忌讳的行为。“有些游客素质差，把筷子弄掉，把碗打翻，不等咪谷发话就抢先吃菜，还用手抓着吃。这样就会破坏民俗，还会给村子带来许多灾难。”（哈播村摩批，2007.1.31）

“以前很多村民都会为客人在自家桌子上掉筷子、打翻碗的事情到咪谷那里敬酒，请寨神原谅，现在一般不去了。”（哈播村民张××，2007.1.31）

具有深刻地方意义的长街宴禁忌和规矩在旅游发展中不断受到主流文化的挑战与消解，一些基于地方的文化认同日渐更新和转化，长街宴成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地方文化。

哈播村民在十余年的旅游发展进程中，由于长期受到游客带来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加之渴望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的现实要求，促使村民们不断根据游客的文化倾向与文化认同来调整自身文化，不断建构一个新奇、独特的地方形象，实现区域文化以及其他要素的旅游吸引。这种文化适应与移民群体和留学人员群体采用不同策略适应当地文化有显著不同。文化适应主要发生在当地村民一边。在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下，在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愿望的要求下，哈尼村民从个人到群体，都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既保持和保护原有的地方

①笔者2009年12月23日在多沙村调研实地见证此习俗。

②年轻的哈尼姑娘小伙唱着祝酒歌，吆喝着“哦扎（干杯）”逐桌向客人敬酒，祝福客人来年幸福吉祥。

③祭祀寨神的猪肉，汉族人称“龙肉”，由于村寨中每户都分到一小块，也有人称为“份肉”。

文化认同,又借鉴或“借取”现代文化的要素,采用 Berry“跨文化适应模型”中的“整合”策略^[3],在地方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在不断的文化调适中,促进昂玛突节长街宴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4 旅游影响下绿春哈尼长街古宴的文化重构

4.1 绿春哈尼长街古宴品牌的形成和发展

绿春县位于云南省南部边境,全县总人口 20.5 万人。其中哈尼族占总人口数的 88.2%,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山区贫困县。哈尼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哈尼山乡重要的文化资本。

绿春县城周边村寨的哈尼村民十月年传统上是不摆长街宴的。2004 年,绿春县委、政府提出建设“哈尼文化生态县”的发展目标,实施文化强县战略,打造长街宴旅游品牌成为文化强县的重要举措。2004 年 11 月 22 日,政府组织县城周边 12 个哈尼村寨,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绿春哈尼十月年长街古宴”活动,近万游客莅临绿春,长街宴桌数达 2041 桌,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誉为“世界上最长的宴席”,列为“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2005 年~2010 年,连续举办长街古宴活动,桌数分别为 1800 桌、1933 桌、2000 桌、3050 桌、2200 桌、1920 桌。

哈尼族十月年的时间是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属龙日,每一年对应的阳历时间不同,给旅游宣传和游客知晓长街宴的举办时间带来不便,对长街宴旅游品牌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十月年正值哈尼族人民喜庆丰收欢度新年,村民们过年还要很辛苦地到城里摆长街宴,有些村民不太乐意;十月年期间绿春经常阴雨连绵,长街宴活动不能很好展示,影响了游客的满意度。2009 年,绿春县委政府决定将长街宴的时间固定在 11 月 30 日,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文化和当地阿罗欧滨文化的“地方性”想象而重构的新节日——“绿春哈尼族长街古宴”成为当地的旅游品牌。长街宴作为新节日的主体内容,周边村寨的哈尼村民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县城摆长街宴和表演民族歌舞,家里不再有其他仪式。

4.2 长街古宴节日活动的重构

绿春长街古宴节日活动是在哈尼族祭祀文化、哈尼族歌舞文化、昂玛突节长街宴等传统民俗文化和哈尼族土特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创造的。

哈尼族信奉万物有灵,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和灵魂观念构成了哈尼人信仰的主要内容。天神、地神、寨神等诸多神灵都是他们供奉和祭祀的对象,甚至一座山、一口井、一棵树或一块石头都是哈尼人祭祀的对象。昂玛突节长街宴的形成与发展也与梯田农耕祭祀文明和宗教价值观念紧密联系,是哈尼族宗教祭祀文化的产物。绿春长街古宴因此将祭祀列为重要活动,在阿罗欧滨风情园祭祀绿春哈尼村民心中最尊敬的神——阿罗欧滨,由政府指定周边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祭祀活动。

哈尼歌舞表演在传统长街宴中是微不足道的。绿春长街古宴充分发掘了哈尼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歌舞文化,哈尼族传统歌舞表演成为绿春长街古宴的重要部分。民族歌舞表演形式丰富,场面宏大,形成不同的场景:一是县城双拥广场上的哈尼民间歌舞表演,长街宴的前 3 天开始,每天 3~4 个村寨轮流表演,内容主要是围绕农耕和生活场景编导的;二是长街宴前一晚的大型歌舞晚会,由州、县民族歌舞团表演地方民族歌舞;三是长街宴当天上午九点由双拥广场到民族风情园的民族方队原生态民族民间歌舞滚动展演;四是长街宴当天晚上县城双拥广场上的万人罗作。

长街宴是哈尼民族文化的精髓，绿春长街古宴以恢宏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哈尼长街宴文化。哈尼服饰文化，哈尼豆豉、木耳、草果、八角等土特产品，哈尼斗鸡、糯米粑粑舂揉等特色民俗活动，都成为绿春长街古宴节日活动的组成部分。通过对传统长街宴元素的重构，以及与地方其他文化形式的结合，旅游影响下的哈尼长街宴不仅实现对于民族文化身份与社会规范的重构，也对地方意义与地方形象实现了彻底的重塑，在文化认同与空间的复杂互动中实现了旅游吸引体系的建构。由此可见，物质性的经济生产领域与精神性的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地方性与文化身份的再生产，对于促进区域经济资本的再生产有着重要作用。

4.3 文化重构中传统民俗的变迁

昂玛突节、苦扎扎节、十月年中的长街宴都以祭祀文化为核心，长街宴的菜肴具有明显的献祭意义^[17]。阿玛萨尼是传统长街宴餐桌上画龙点睛的食物，有着深刻的宗教意义。传统长街宴与梯田文明紧密相连，许多村寨都保持着以野生动植物为主的传统饮食习俗，魔芋、泥鳅、水芹、豆芽、白旺等是特色菜肴，特别是魔芋和泥鳅，据说是女性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是长街宴最重要的食材^[22]。竹虫、云雀鸟、小鱼、蜂蛹等干菜是村民们平日捕获收藏的，是村民日常劳动实践的体现。而绿春长街宴的宴席是供游客享用的，没有阿玛萨尼，更没有传统的宗教意义。绿春长街古宴菜谱所列 40 余种菜肴多为哈尼特色菜，如哈尼蘸水鸡、泥鳅等。一些传统的菜肴在文化重构过程中被排挤出了地方形象的建构体系之中，例如：白旺由于其生血的成分，魔芋由于其价值较低，均被列为不准上桌的菜。

哈尼族宗教祭祀肃穆、庄重、虔诚，有特定的时间、地点、仪规，绿春长街古宴的祭祀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仪式，缺少宗教文化的内涵。例如，长街宴咪谷、摩批的特定座位被安排给重要官员和嘉宾，开餐仪式交由官员主持。绿春长街古宴还摆脱了传统的长街宴对哈尼妇女的诸多禁忌，设置了几百桌姑娘宴，每桌有两名 35 岁以下的哈尼妇女为客人服务，妇女们给客人唱祝酒歌、敬酒、碰杯。而碰杯在哈尼族传统文化中是讲规矩的，年轻人不能跟长辈碰杯，女人更不能与男人碰杯。

文化重构是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是地方性的有意识的动态的再生产过程^[23]。绿春长街古宴文化重构中传统民俗的变迁，正是长街宴文化进行自我调适并充分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

总之，绿春哈尼长街古宴是综摄了哈尼族传统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文化品牌，无论从时间、地域、文化内涵、活动内容，还是从主办、参与角色方面都是哈尼族民俗传统文化传统规则和资源的再创造，尽管这些仪式所展现的只是一种舞台化的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只是营造了一种“想象的地方性”，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积极的意义。

5 长街宴从地方到舞台和市场的文化变迁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传统节日的旅游开发和节日文化的变迁。本文阐述的两个案例显示了少数民族节日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两种变迁模式。

哈播村昂玛突节长街宴是村民自己的节日，世代自发传承并且潜移默化地深入村民心理文化的深层。

“不管游客来不来，我们都要摆（长街宴）；政府补不补钱，我们也要摆（长街宴）”。

（哈播村民张××，2009.12.25）

村民们在乡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参与长街宴的旅游开发,文化适应功能活跃。由于政府干预小、游客少、村民强烈的地方文化认同,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虽然经历了激烈的文化适应过程,但本质上保留了长街宴的地方特色和宗教文化内涵。

游客佩戴的彩蛋和嘉宾证,是客人入座长街宴的凭证。尽管之前村干部反复交待村民要有嘉宾证才能入座,但村民对所有参加长街宴的宾客都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他们仍然秉承着“来的就是朋友,就要热情接待(哈播村民李××,2009.12.23)”的纯朴与热情。

村民们一方面盼望旅游获得经济收益,带来村寨和自家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很多自助游客可以不花一分钱欣赏哈播的梯田美景,品尝长街宴的美味佳肴,感受哈尼民俗文化。从这个层面上看,哈播地区长街宴的文化适应过程以本地村民自发的文化互动行为为主,村民与游客之间的文化适应虽然也在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认同与文化倾向之间自发的、自然的互动行为。这也解释了哈播村民从旅游活动获得的收入有限、经济利益难以实现最大化的现象。

与哈播村不同,绿春长街古宴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的高起点旅游开发,以发展旅游经济为主要目的。长街宴文化被人为地从地方文化系统中包装出来,考虑旅游市场需求,在哈尼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重构,重构过程中全方位吸取民族文化的精粹,以舞台化形式展演。重构的长街宴在原有的价值基础之上产生出新的价值或意义,产生文化增殖,表现出量和质上的放大。量的放大主要指传播面由当地哈尼村民扩大到广域游客,质的增殖是指文化传播中旅游经济意义的增加。

旅游的发展使得文化的“游离机制”成为可能^[24]。哈尼长街宴这种过去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土生活”的文化材料,其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哈尼村寨、寨神林和村民等要素“在场”的条件下才有效的东西,由于旅游经济和游客的参与,现在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打破地域文化的局限,通过对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掘出长街宴文化要素在特定的时空地带“再联结”,形成了绿春哈尼长街古宴、昆明旅游节小吃长街宴等与长街宴文化相关的旅游文化品牌。

长街宴之所以能够从哈尼村寨传统的节日饮宴到绿春县城自觉的文化重构,再到昆明国际旅游节等的文化借用,由地方走向舞台和市场,地方发展经济对旅游发展的诉求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发展旅游经济的现实要求促使政府权力的介入与干预。俄扎乡政府在1994~2008年的15年间,与哈播村村民共同成为昂玛突节长街宴节日活动主办、实施的两大主体。乡政府负责邀请省、州、县相关部门的领导、嘉宾和媒体,准备来宾的礼物,安排来宾的食宿、给每户村民发放补贴等,政府给摆长街宴的村民的补贴由1995年的每桌30元增加到2008年的每桌50元。村民则承担游客的迎接和长街宴的宴席。

绿春长街古宴更是在政府主导支持下形成发展的,政府出政策、出资金、出人员,动员协调各类资源。2004年,政府统一购买竹篾餐桌,安排哈尼餐馆和周边村寨村民在县城摆长街宴,广发请柬,邀请嘉宾,畅游长街宴。随后的几年,政府、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共同出资邀请嘉宾。2009年,政府不再参与具体事务,交由市场运作,6000多张长街宴餐票单位购买占三分之二,散客通过电话和亲朋好友购买占三分之一。长街宴经过几年发展,已经由政府组织承办向政府、部门、企业、个人多头承担,再逐渐向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转变。可见,政府权力是旅游发展进程中长街宴文化变迁与重构的关键因素。

6 结论与讨论

哈尼长街宴在十余年的旅游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嬗变的痛苦,获得了成功的辉煌。在发展旅游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从地方走向世界文化。

元阳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时,“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产生了冲突,突出体现“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文化适应促成了“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融合。绿春长街古宴,政府主导重构地方文化,糅合再造了本土特色,更像是人类学家王铭铭所说的一种“政治校正方式”,促成或制造民族历史的“官方说明”^[25]。

从哈尼长街宴的嬗变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任何文化的形式与内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关系中形成的地方传统文化,随着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不断进行调适与重构,并重新定义了地方文化认同的内涵与特质。由特定的地方文化实践所定义的地方性本身,也在不断被再生产、再建构出来。理解地方性的变迁过程,必须从理解特定的地方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入手^[26]。现代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节日文化传统的繁荣,客观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必须注意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将文化实践打包进行商业化“销售”的过程,而是文化内涵本身与地方性不断重构与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文化传统内在的变迁,是民族文化研究中值得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致谢:感谢本文所有受访者的支持!感谢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汪力、汪静波、李红等同学的野外协助调研和杨殷迪同学对本文图件的制作!

参考文献:

- [1] Redfield R, Linton R, 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 38(1): 149~152.
- [2] Adler P S. The transitional experience: An alternative view of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75, 15(4): 13~23.
- [3] 杨宝琰, 万明钢. 文化适应: 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 *世界民族*, 2010, (4): 1~9.
- [4] Berry J W.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Padilla, A.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9~25.
- [5] Bourhis R Y, Moise L C, Perreault S, et al. 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7, 32(6): 369~386.
- [6] 杨甫旺. 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6): 127~132.
- [7] 马剑. 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创造与保持——帕西傣春节习俗形成探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0, 32(3): 95~98.
- [8] 孙进. 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西方的理论与模型.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0, 221(5): 45~52.
- [9] 张劲梅, 张庆林. 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与国外族群关系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 2008, 94(4): 82~87.
- [10] 彭克宏. *社会科学大词典*.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 10.
- [11] Cohen E.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3): 371~386.
- [12] Cano L M, Mysyk A. Cultural tourism, the state, and day of the dea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4): 879~898.
- [13] Cahir D A, Clark I D. “An edifying spectacle”: A history of “tourist corroborees” in Victoria, Australia, 1835~1870.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3): 412~420.

- [14] 明跃玲. 文化重构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以湘西民族旅游文化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7, 34(1): 71~76.
- [15] 邢启顺. 旅游开发与乡土传统文化重构——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乡土传统文化产业.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36(5): 28~31.
- [16] 杨昌儒. 民族文化重构试论——以贵州布依族为例.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1): 66~71.
- [17]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15-51.
- [18] Rose G. As if the mirrors had bled; Masculine dwelling, masculine theory and feminist Masquerades. In: Duncan N. *Bodyspace: Destabilizing Geographi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56~74.
- [19] Gregson N, Rose G. Taking Butler elsewhere; Performativities, spatialities and subjectiv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0, 18(4): 433~452.
- [20] 朱竑, 钱俊希, 陈晓亮. 地方与认同: 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 人文地理, 2010, 25(6): 1~6.
- [21] Zhu H, Qian J, Feng L. Negotiating place and identity after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1, 12(2): 143~158.
- [22] 陈永邨. 欢腾的圣宴——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39. 180.
- [23] 周丽洁. 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 求索, 2010, (4): 113~115.
- [24] 周宪.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7.
- [25] 王铭铭. 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182.
- [26]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146.

Cultural ada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festival activit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Hani Long-Street Banquet

TANG Xue-qiong¹, QIAN Jun-xi², CHEN Lan-xue¹

(1. Ecotourism Faculty,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2. School of GeoScienc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EH8 9XP, Scotland, UK)

Abstract: In a broad context of the ethnic tourism development, cultures of ethnic festivals are now continuously undergoing conflict and amalgamation between lo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alien cultu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Long-Street Banquet, an important festival activity of Hani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ur ca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in two areas, namely Habo and Luchun. Our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due to government-led tourism, the Long-Street Banquet of Hani is performed as a festival tourism product to adapt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modern society brought by tourists. By this, the Long-Street Banquet of Hani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it is staging itself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and from local identity to world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adap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cultures of ethnic festival; Long-Street Banquet